

语言教学中语言的文化价值的调查

[A Survey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ripaha Upananda¹

Abstract

Languag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s considered a part of the wider field of language.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n additional skill in teaching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re intertwined,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a living language. Chines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Sinhal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ri Lankan culture. When studying these languages as foreign languages, one must focus on their cultural values. Unlike teaching a first language, teaching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requires learning a language as a whole. Considering these facts, a new trend of crea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has been adopted since the 1990s. Throughout the 20th century, new methods and strategies have been

emerg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measure the skills of all th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Therefore, applied linguists point out that cultural competence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 is how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value of language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values of Chinese and Sinhal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definitio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for the study.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Finally,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cultural value of language should be developed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Sri Lanka.

Keywords: Applied linguistics, Chinese, Culture, foreign languages, Sinhala

1. Phd Candidat,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theupananda@busl.ac.lk  <http://orcid.org/0009-0005-1760-3195>



Received: 10 Feb. 2025, Accepted revised version: 12 June 2025.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 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摘要

语言是一种文化遗产。文化被视为语言这一更广泛领域的一部分。文化一直被视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一项附加技能。语言、文化和社会相互交织，这是活语言的本质。汉语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僧伽罗语与斯里兰卡文化密切相关。在研究这些语言作为外语时，必须关注它们的文化价值。与教授第一语言不同，教授第二语言或外语需要整体学习一门语言。考虑到这些事实，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采取措施创造教学和学习方法的新趋势。整个二十世纪，新方法和新策略不断涌现。听、说、读、写是衡量所有这些教学和学习策略中的技能的主要因素。此外，应用语言学家注意到，文化能力应该纳入语言教学和学习的过程。研究的问题是如何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语言的文化价值。本研究的目的是从语言学定义的角度分析汉语和僧伽罗语的文化价值。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数据是根据定性方法从主要和次要来源收集的。最后，通过考察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得出结论：应该将语言的文化价值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发展，并融入斯里兰卡的汉语教学中。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汉语、文化、外语、僧伽罗语

引言

分词 'bha:sa:' 源自词根 'bha:s', 在梵语中意为清楚、简洁地表达心里的想法。使用了两个词 "bha:səṇa" 和 "bha:sa:wə"。现代语言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两个词的区别。Ferdinand de Saussure 指出了与语言相关的三种独特情况。

La Langue - 标准语言

La Langage - 语言趋势

La Parole - 演讲

“La Langue”的概念是指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概念指的是中文和僧伽罗语等语言。“La Langage”是指人类掌握某种语言的语言倾向。“La Parole”的概念意味着通过语言说话。这三个事实说明，人类天生就具有掌握语言的能力，人类通过社会习俗所确立的“语言”在社会认可的语言的帮助下进行言语交流。语言是最重要的言语工具。天生的语言倾向有助于这种使用。因此，很明显，社会规范和语言之间存在一些后续的一致性。本研究的目的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汉语和僧伽罗语的文化价值。

文献综述

在审查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时，研究了斯里兰卡国家委员会 2003 年和 2016 年关于斯里兰卡普通教育的国家政策提案。这样做的目的是研究斯里兰卡过去几十年来在第二语言教育中如何注重文化能力。K. N. O. Dharmadasa 的著作《双语主义》（1966 年）对社会语言学进行了分析性描述。虽然这本书可以作为研究与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但应该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正在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而不仅仅基于那些事实。Dharmadasa 的书《语言与社会》（1996）讨论了语言与社会。不过，也有关于语言文化的讨论。它可以作为介绍语言文化价值的资源。使用僧伽罗语的例子来解释某些细节有助于用研究理论问题。J. B. Dissanayake 的《人类语言导

论》(2005)以非常简单的方式呈现了理论事实。人类语言的本质、应用形式、历史、新方法等。以新的方式呈现。然而,这个来源可以用于进一步研究语言的文化价值。

国内外有大量关于该主题的文献。根据所使用的资料来源,本研究“语言教学中语言的文化价值的调查”是一项使用与文化价值相关的第二手资料和第一手资料的新研究。

研究目的

研究目标是利用语言学家的定义,结合汉语和僧伽罗语的关联,概述语言的文化价值。这是因为文化研究是第二语言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是:文化能力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传授的语言技能中占据多大语言重要性,在第二语言教育中应基于什么理由更加重视文化等。本研究期望揭示现实的、合乎逻辑的事实。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根据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运用了多种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通过观察选定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文献分析法则用于探索理论事实。此外,研究还探索了部门出版物和书籍、互联网和非书面信息的观察、与学者的讨论、与学生和教师的讨论、在第二语言方面具有多年经验的学者的意见以及自己的经验等次要和主要来源来收集数据。这样,根据主题和子主题依次检查获得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编码、总结、分

类,并根据内容分析进行研究。

理论背景

本研究属于应用语言学中的第二语言与外语教学研究,以第二语言与外语教学下的学习技能研究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研究的重点

语言教师必须探索语言学习技巧才能正确教学。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了解学习技巧对于使用准确及时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来教授汉语和僧伽罗语外语是多么有效。这项研究表明,在斯里兰卡教授汉语时应更加重视文化能力。

讨论

语言教学过程中对文化能力的需求

与第一语言教学不同,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需要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学习。考虑到这些事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创造教学方法的新趋势。新的方法和策略在整个二十世纪层出不穷。其中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方法最为突出。有些方法很流行,有些方法与流行方法混合并保留至今。听、说、读、写是衡量所有这些教学策略技能的主要因素。

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方法中,交际语言教学、直接法、视听法等只注重言语的方法受到语言学家的批评,而语法翻译法等只注重写作的方法则表现出疲软的迹象。同时,基于任务的语言学习、折衷方法等方法也受到语言学家的推崇。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成就四种技能。除了能够传授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此,将文化能力

纳入语言教学过程受到应用语言学家的关注。同时，Fleming 和 Mills 于 1992 年提出的 VARK 模型比较特殊。该模型的文化能力受到了特别关注。

- i. 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
- ii. 目标群体
- iii. 四种语言技能：听、说、读、写
- iv. 文化意识
- v. 目标文化
- vi. 自己的文化
- vii. 跨文化沟通技巧
- viii. 融合文化、社会和生活方式

此外，欧洲共同参考框架中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应由文化能力吸收。“我们随时都可以遇到子谦的语言现象。如遇到他人称赞时，我们往往谦虚地说“过奖了”，“您夸奖了”，“不敢当”，“不行不行”，“哪里哪里”，“还要努力”“大家的功劳”，“大家做的都很好”等等。”（大群，2008：58）语言学习中获得的四种技能是一种内功。文化能力是一种外在能力。了解语言的社会因素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文化就无法确定语言的含义。

文化能力在汉语教学过程的重要性

一些中国研究资料指出，教师掌握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教学知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积极途径。“外语教学以跨文化交际为基础。”（李红，1998：27）这是因为每一位教授对外汉语的老师都面临着来自世界各

地、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学生群体。

要重视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必须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让他们获得这种能力，才能成功的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要注意教师的教学策略，在文化导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具有正确的态度，冷静客观，实事求是。”（黄炎，2009：74）

词语的意义是由说话的群体相互赋予的，而不是通过自然或先天的力量或其他方式获得的。研究中国文化是学习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像任何其他语言一样。基于上述事实，茶艺被作为与中国和斯里兰卡相关的重要文化方面进行研究。

在中国教授语言和文化

打破了教室的沉寂，从小学到大学，中国各地的教室里都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重复声。中国许多学校都采用“教师主导”的教学方式。在这里，教师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成为课堂上最重要的人。这使教师成为权威人物，成为学科知识的唯一来源。中国人认为，学生通过记忆通过重复和做笔记获得的信息来学习效果最好。因此，教师采用系统化的方法来规划和授课。这种方法几乎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几乎不需要课堂资源，也很少允许学生参与。

教师主导教学法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文化价值观和信仰。高考是激励各个年龄段学生良好行为的强大动力。高考的重要性影响着中国的教学方法。记忆被认为是成功获取大量知识的主要方式。在中国课堂

上，教师的“专家”地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这种自信使学生有兴趣听老师讲课。

然而，在中国，教授外国人汉语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教材已经编写，涵盖了四项技能和文化。根据教材，教室的设计以及教学设备与新技术的结合。学生的参与度得到了发展，包括提问和辩论的能力。教师从代理层转变为贡献层。因此，外国学生有机会在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汉语。这种成功不仅仅是接近语言环境。原因在于课堂教学方法的巧妙性。

在斯里兰卡教授语言和文化

“多年来，斯里兰卡一直试图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转而采用受西方国家启发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教师不再充当权威人物，而是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完成学习过程。学生被视为贡献者而非接受者，注重小组互动。学生是学习过程的关键参与者，被鼓励提出问题并挑战想法和概念。重点放在培养深刻理解和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技能上。因此，偏向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包括小组讨论、解决问题和跳出框框的思维。这种方法使学生在学术和非学术环境中都具备有用的知识和技能。”（Wikipedia, 2024）语言教师、教学方法和有效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主要关注点应放在学生的听、读、说、写四项技能上。当学生从事一项富有成效的任务时，他们需要关注他们有哪些选择，而他们可用的资源、技能和信息与成功完成该任务之间存在差距。教师有责任利用现有资源、技术和策略（如使用语法书和词典）使教学方

法更容易。因此，可以假设教师在斯里兰卡学校教授中文时所面临的个人困难（如缺乏资源）直接影响教学方法的成功。面对困难时，应该系统地改变教学方法的策略。

斯里兰卡第二语言教育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文化教育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不让学生自主掌握文化技能。相反，文化内容被纳入课程，这意味着文化问题的讨论频率低于语法、写作、阅读、口语和听力等其他学科。

语言和文化

语言是打破人类与社会隔离的绝佳策略。语言促进了人类的社会旅程。人们认为沉默是可疑的。沉默是别人不喜欢的。语言是使人类生活愉快的重要因素。语言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无数种语言。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里，人类使用了多少种语言。甚至语言学家在过去两三个世纪记录的一些语言今天也已经灭绝了。今天使用的语言大约有五千种，它们都是过去一些语言的后代。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将语言定义为“人们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和参与者用于相互活动和交流的口头符号的共识系统。”这一定义中的“人类使用的一套惯例”和“互动”等短语表明了语言和文化的共识性和相互交织性。这是文化的事情。Malinowski 根据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经验对“社会对话”这一主题进行了评论，他提出了证据表明语言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不是表达思想，而是促进社会运动并帮助使工作更轻松。

“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L.R. Palmer, 1967）美国语言学家Edward sapir教授说：“语言背后有一些东西。而且，没有文化，语言就不可能存在。文化是从社会继承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集合，它们组织着我们的生活。”（游汝杰，1993：1-15）“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活组织。”（游汝杰，1993：1-15）人类学家E. B. Tylor将文化定义为：“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知识以及一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游汝杰，1993：1-15）这些评论表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从词语的起源和演变推演过去文化的根源，从构词心理看文化层次，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迹象，从姓氏、昵称看民族起源和宗教信仰，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游汝杰，1993：1-15）Karl marx 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定义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Ludwig wittgenstein 定义为：“语言是思想的边界。语言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就像比例尺地图与真实的地图的关系一样。语言的边界即是我的世界的边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以语言的方式有世界，不仅仅是工具，而就是存在本身。一开始是我们创造了语言，后来是语言塑造了我们。”Wilhelm von humboldt 定义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游汝杰，1993：1-15）“语言是文化的底片或者胶片”，“语言是文化的投影或胶片。”，“语言的产生脱离动物界的最重要的标志”，“人类文化的诞生，又极大

地促进了其他文化现象的诞生和发展。”（游汝杰，1993：1-15）上述定义说明了对语言教学‘中文化能力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只关注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方式的智力方面，我们将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语言的本质。”

（Sugathapala, 1963：2）因此，为了理解语言的真正本质，必须摆脱智力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极端。即使在心理学对心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时，强调语言是一种纯粹的物理行为或心智内部运作的表现也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现代语言学对语言进行了中立的研究。这种介绍有助于对语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目前，最被接受的语言观点是 Bernard Bloch 和 George L. Trager 提出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系统的任意性系统，是用于人类交流的语言符号。”这个定义的任意性可以导致对语言的文化性质的一些形成性解读。

任意性

语言中存在着一套普遍接受的语音、符号、词语、语法、语用、语义等系统。当声音组合成单词或短语时，概念和词语、字符和词语以及字符和声音之间是匹配的。这种情况因语言而异。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含义。在这里，正常的声音变成了意义。这种性质被称为标准化。

僧伽罗语中的“gasa”一词在僧伽罗语中是标准化的。中文中的“树”一词在中文中是标准化的。世界上没有人能理解这些。只有那些懂那种语言的人知道它们。说不同语言的人对它的称呼不同。僧伽罗语中的彩虹有七种颜色。如紫

色、蓝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靛蓝（混合色）。在中文中，彩虹有七种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同样的东西在每种语言中都显示出不同的意义组织。因此，标准化意味着每种语言特有的词语都可以根据该语言来理解。这指的是人类语言中存在的语义组织的专业化。“人类语言中看到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意义组织的专业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语言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意义组织的专业化。”（Dhammakiththi ther o, 1983: 213）

此外，E. H. Stertivant、J. B. Karol、J. Mario and Frank ganer、Simiyon potter、David Cristal、Norm Chomsky、Lenard Blumfield 等人都对语言作出过定义。j. b. dissanayake 认为语言具有普遍而公平的特征。他认为，如果所有语言，无论何种语言，都没有共同的特征，那么语言在交流中的使用将极其困难。（J. b. Dissanayake, 2005: 46）语言及其文化形式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当一个人需要食物时，如果他自己无法得到，就有可能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让别人来满足他的需求。当将人类交流与动物交流进行比较时，文化被认为是人类语言的一个特点。Charles R. Hockett 对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比较解释在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1. 位移
2. 任意性
3. 生产率
4. 文化传承

5. 二元性
6. 易学性
7. 反身性
8. 搪塞
9. 谨慎

文化传承

语言是一代又一代地转化和变化的。这意味着人类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遗产，而是文化遗产。人类只能完全掌握一种语言。这种观点是语言学中的流行观点。这种观点导致了双语概念的出现。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母语占据着这一地位，或者说是他或她最先熟悉的语言。有时僧伽罗母亲所生的孩子的母语可能是汉语。在那里，他母亲的语言不是他自己的。原因是语言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Hockett 认为人类语言不是作为先天遗产而习得的，而是作为文化禀赋而习得的。动物的交流方式是从出生开始遗传的。”（Dhammakiththi ther o, 1983: 214）

Ratna Wijetunga 认为，语言是一代又一代地演化和变化的，是文化元素、语言文学等的流动，是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传统。在这里，时间性、连续性、原型的丧失和新元素增加等特征，都是传统元素演化的特征。这些因素影响着语言性质的变化。“世界语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可以认为，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源自人类用来表达经验和思想的早期。因此，每种使用的语言都有自己的传统，也能看到身份特征。其中，一些语言与其他语言表现出密切的世

代关系，而其他语言则表现出遥远的关系。因此，语言学家的天性就是考虑语言群体以及属于它们的母语、分支和分支。”（Sirisumanathero, 2007: 108）通过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对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它的文化特征有所了解。

一些中国研究的人士指出，教师对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教学的了解是进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一种积极方法。“这是因为每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都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地、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学生群体。语言与文化，虽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两者的密切关系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此汉语教师要树立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并时刻保持清醒的多元共生意识。平等对话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炎，2009: 74）“将跨文化交际技能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非常重要。要重视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必须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让他们获得这种能力，才能成功的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炎，2009: 74）

“汉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教学工具。要注意教师的教学策略，在文化导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具有正确的态度，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炎，2009: 74）词语的意义是由使用者相互赋予的，并非通过自然或先天的力量或其他方式习得的，学习中国文化是学习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语言的功能

语言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人类的发展得益于语言能力，而语言能力是

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文化可以通过关注语言的作用来理解。语言的功能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语言是人们作为语言社会成员和文化参与者进行相互活动和交流时使用的约定俗成的词语符号系统。(block 和 treger) 他们在这里总结了语言的作用。这个定义并没有表达语言的主观功能。可以将语言的整个过程归类为标题和小标题，以明确语言的功能。

社会功能

1. 沟通

一般传播（思想和知识交流）

大众传播

教育

i. 正式

ii. 非正式

情感表达

iii. 艺术/美学

iv. 人际情感表达

2. 开展相互活动

指挥他人、组织、控制

共同努力

友善

享受

i. 社交享受

ii. 自我享受

宗教功能

支持性工作

人类文化的传承

主观功能

1. 思考
2. 自言自语
3. 自娱自乐

(Sugathapala, 1963: 2)

Block 和 Traeger 介绍了语言的作用，即“社会群体通过语言进行合作”。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使其不至于分崩离析。此外，Roman Jakobson 和 Karl Buhler 对所有这些主观功能和社会功能都进行了清晰的解释，提出了十二个要素。文化功能就是其中之一。

1. 指称功能
2. 情绪功能
3. 工具功能
4. 交际功能
5. 表演功能
6. 调节功能
7. 信息功能
8. 想象/文学功能
9. 娱乐和运动功能
10. 元语言功能
11. 个人功能
12. 文化功能

文化功能

文化工作是多种事物的结合。语言用于承载文化。语言的文化功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语言对促进人类文明的作用是巨大的。语言作为‘某种文化的成员’，被用于任何其他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Dissanayake 等, 2010: 16) 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语言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的想法。在研究语言和文化时，会发现“语言是文化的推荐”、“语言是文化的镜子”、“语言是文化的反映”等定义。世界上一些语言的词汇受到该语言环境中固有的文化的影响。斯里兰卡有很多与农业有关的词汇迁移。汉语有很多与泡茶有关的词汇。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变化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发生了。“人类不仅仅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他们还生活在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中。”(Dharmadasa, 1963: 100)

这表明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其使用的自然环境所塑造的。人类习惯在自然环境的背景下创造文化。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对Mindanao的 Subanon 农部落进行了调查。在该语言中发现了 186 种疾病名称、724 种药物名称和 61 种治疗方法名称。如果某种语言的某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大量词汇，那么显然该学科领域在该文化中很重要。文化形式还反映在某些语言的语法中，汉语中，表达一个事物时，要根据事物的大小、质量、形状等，使用不同的量词。僧伽罗语不具备此特性。

一个人

一张表

一件衣服

一只狗
一本书
一台电脑

僧伽罗语中的名词既有单数形式，也有复数形式。僧伽罗语中名词后加后缀。汉语中的名没有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区别。如果需要，可以调整复数形式。这表明文化的影响也通过语言的语法表现出来。但语言的某些文化特征是无法定义的。“有时这些特征可能是过去某些文化特征的残余。否则，它们可能只是出于语言计划的文化需要。我们只能说语言计划的某些特征与文化的某些特征是平行的。

(Dharmadasa, 1963: 119) Edward Sapir 认为语言代表了比文化更大的经验领域。“我们应该注意萨皮尔陈述中的两个要点。首先，语言代表了比文化更大的经验领域。语言可以表达与文化无关的东西，人类所假设的东西，有时甚至挑战文化传统。语言的潜力在于它具有不受文化限制的广泛结构。语言的传播一方面是由于历史遗迹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由于语言的计划方法的性质。第二点是，由于文化比语言更有限，因此不能指望语言总是会根据那里发生的变化而采取行动。

(Dharmadasa, 1963: 120) 因此，很明显，语言是一个比文化更重要的单位。语言是存在着变化的。文化应该被视为语言更广泛领域的一部分。

研究结果讨论

本研究首先对语言进行了基本的识别，然后开始讨论，考虑了文化能力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必要性和价值。本节讨论了文化能力在第二语

言教学中受到的重视程度。考虑到所有国际和科学观察，各方都毫不犹豫地同意教授语言文化的必要性。接下来，探讨了汉语教学中文化能力的必要性。本节着重探讨学者们对汉语文化教学及其价值的看法。他们认为，汉语教师必须了解文化。了解中国这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文化，是教授汉语，尤其是汉语的关键因素。接下来讨论中国和斯里兰卡语言和文化教学的情况。本节讨论中国和斯里兰卡第二语言教育的现状。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能力在斯里兰卡的第二语言教学中并不被视为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接下来，从学术定义的角度探讨语言与文化以及文化能力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比较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探讨语言的文化价值，之后探讨语言的功能，揭示文化在语言中的价值。Roman Jakobson 和 Karl Buhler 的解释，进一步探讨了文化在语言中的运用。总体观察证实，语言和文化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事物。而且文化的引领也是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斯里兰卡的第二语言教育中，汉语教学中，充分重视文化能力而不是过分强调文化能力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聘请能够充分传递文化的中文母语教师将是更有效的学习策略。

结论

在外语中，汉语教学是最复杂的过程。除了四种技能外，文化教学也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各种观察表明，文化能力是一门需要单独探索的学科。将其与其他内容结合起来教学会减少对它的关注。作为一种合适的替代方案，建议将文化能力作为课程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最

后，本文得出结论，在斯里兰卡汉语语言文化研究应被视为一个特殊领域，并设立在第二语言教育中。

参考文献

- කරුණාතිලක, එස්. ඩබ්. (සංස්.) (2000). සම්භාෂා
11. බත්තරමුල්ල: අධ්‍යාපන අමාත්‍යාංශය.
- දිසානායක, ජේ. බී. (2005). මානව භාෂා ප්‍රවේශය, කළුබෝවිල: සුමිත්‍ර ප්‍රකාශකයෝ.
- දිසානායක, ජේ.බී.(1997). 'භාෂාව හා වාග්විද්‍යාව' සමාරම්භන ලේඛන සංගීතා, 90.
- දිසානායක, ජේ.බී.(1973). සමකාලීන සිංහලය. කොළඹ: ශ්‍රී ලංකා විශ්ව විද්‍යාලයේ කොළඹ මණ්ඩපයේ මුද්‍රාංකණ මණ්ඩලය.
- ධර්මදාස, කේ. එන්. ඩී. (1996). ද්විභාෂකත්වය. කොළඹ: රජයේ මුද්‍රණ දෙපාර්තමේන්තුව.
- ධර්මදාස, කේ. එන්. ඩී. (1996). භාෂාව හා සමාජය, කොළඹ: ගොඩගේ.
- ධර්මදාස, කේ. එන්. ඩී. (1999). භාෂාවේ සම්භවය හා සංස්කෘතික මුහුණුවර, කොළඹ: ගොඩගේ
- ධම්මකිත්ති හිමි, රණව (සංස්.) (1983). විද්‍රවස ශාස්ත්‍රීය සංග්‍රහය. හෙට්ටිමුල්ල: විද්‍යාවාස මහ පිරිවෙන.
- පර්යේෂණ හා සංවර්ධන දෙපාර්තමේන්තුව, අධ්‍යාපන පර්යේෂණ පාරිභාෂික වදන් මාලාව, (2013). මහරගම: ජාතික අධ්‍යාපන ආයතනය.
- බලගල්ලේ, විමල්.පී.(1995). භාෂා අධ්‍යයනය හා සිංහල ව්‍යවහාරය.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අස්සපිතිස්ස හිමි, කුරුපිට (සංස්.) (2016). ප්‍රඥාසාර ශාස්ත්‍රීය සංග්‍රහය දෙවන කලාපය. කැලණිය: කැලණිය විශ්වවිද්‍යාලය.
- කරුණාතිලක, ඩබ්ලිව්. එස්.(2005). භාෂා සමීක්ෂා.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කරුණාතිලක, ඩබ්ලිව්. එස්.(1996). වාග්විද්‍යා ප්‍රවේශය.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කරුණාතිලක, ඩබ්ලිව්. එස්.(1995). සිංහල භාෂා ව්‍යාකරණය. කොළඹ: එම්. ඩී. ගුණසේන සහ සමාගම.
- බලගල්ලේ, විමල්.පී.(2014). භාෂි සන්නිවේදනය අර්ථවිචාරය හා උපයෝගිතා විචාරය.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බලගල්ලේ, විමල්. පී.(2004). සිංහල භාෂාධ්‍යයන ලිපි 1.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බලගල්ලේ, විමල්, පී.(1992). සිංහල භාෂාවේ සම්භවය හා පරිණාමය.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බලගල්ලේ, විමල්.පී.(1998). සිංහල භාෂාධ්‍යයන ඉතිහාසය.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බලගල්ලේ, වි. ජී. (2001). භාෂා අධ්‍යයනය හා සිංහල ව්‍යවහාරය. කොළඹ: ගොඩගේ.
- සිල්වා, සුගතපාල. (1963). භාෂා විමර්ශනය. මහරගම: සීමාසහිත සමන් ප්‍රකාශකයෝ.
- රාජපක්ෂ, ආර්.එම්.ඩබ් (සංස්.) (2017). කරුණා.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රාජපක්ෂ, ආර්.එම්.ඩබ් (සංස්.) (1992). භාෂා විශ්‍රාන්ත 2. කොළඹ: සමයවර්ධන.
- රාජපක්ෂ, ආර්.එම්.ඩබ් (2009). වාග්විද්‍යා ප්‍රවේශය 2. කැලණිය: වාග්විද්‍යා අධ්‍යයන අංශය
- රාජපක්ෂ, ආර්.එම්. ඩබ් (සංස්.) (1994). වාග්විද්‍යා 8. කැලණිය: වාග්විද්‍යා අධ්‍යයන අංශය.
- රාජපක්ෂ, ආර්.එම්.ඩබ් (සංස්.) (1995). සම්භාව්‍ය ශාස්ත්‍රීය ලිපි සංග්‍රහය. කැලණිය: සම්භාව්‍ය ප්‍රකාශන.
- රාජපක්ෂ, ආර්.එම්.ඩබ් (සංස්.) (1995). සම්භාව්‍ය ශාස්ත්‍රීය ලිපි සංග්‍රහය 2. කැලණිය: සම්භාව්‍ය ප්‍රකාශන.
- විජේමාන්න, පියසීලි (2016). භාෂා විමසා.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විජේසේකර, ජානකී, සන්ධ්‍යා.(2009). භාෂාව සහ මනස. කැලණිය: වාග්විද්‍යා අංශය.

- වික්‍රමසිංහ, එම් (සංස්.) (1987). වාග්විද්‍යා 3. කොළඹ: රජයේ මුද්‍රණ දෙපාර්තමේන්තුව.
- වික්‍රමසිංහ, එම් (සංස්.) (1994). වාග්විද්‍යා 5. කැලණිය: වාග්විද්‍යා අධ්‍යයන අංශය.
- විජේමාන්න, පියසීලී (2016). භාෂා විමංසා. කොළඹ: ගොඩගේ සහ සහෝදරයෝ (පුද්.) සමාගම.
- විමලානන්ද හිමි, ගල්කිරියාගම (සංස්.) (2003). වාග්විද්‍යා 8. කැලණිය: වාග්විද්‍යා අධ්‍යයන අංශය.
- සිරිසුමන හිමි, අගලකඩ (සංස්.) (2007). මහාවාර්ය කුසුමා කරුණාරත්න අභිනන්දන. කොළඹ: විජේසූරිය ග්‍රන්ථ කේන්ද්‍රය.
- ශ්‍රී ලංකාව. ජාතික අධ්‍යාපන කොමිෂන් සභාව (2003), ශ්‍රී ලංකාවේ සාමාන්‍ය අධ්‍යාපනය පිළිබඳ ජාතික ප්‍රතිපත්ති රාමුවක් සඳහා යෝජනා, සීමාසහිත දීපානී මුද්‍රණ/ප්‍රකාශන (පෞද්ගලික), කොළඹ.
- ශ්‍රී ලංකාව. ජාතික අධ්‍යාපන කොමිෂන් සභාව (2016), ශ්‍රී ලංකාවේ සාමාන්‍ය අධ්‍යාපනය පිළිබඳ ජාතික ප්‍රතිපත්තිය සඳහා යෝජනා, ජාතික අධ්‍යාපන කොමිෂන් සභාව, නුගේ ගොඩ.
- 李 红. (1998).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27.
- 袁 新. (2003). 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35-43.
- 高剑华. (2007).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 教育科学, 23-30.
- 汝杰, 游. (1993).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汝杰, 游. (2003).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 常培, 罗. (2003). 语言与文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福义, 邢. (1990). 文化语言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达摩迪那. (2016). 斯里兰卡汉语教学形势和开展导论[J]. 凯拉尼亚大学人文学院.
- 官品. (2017). “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教育交流策略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12-22.
- 黄洁. (2019). 斯里兰卡本土汉语教师及学习者情况调查[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12-22.
- 杨刚. (2016). 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的传播[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2-22.
- 杨刚. (2015). 斯里兰卡汉语快速传播: 小国经验的大启示[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72-79.
- 赵杨. (2003). 第二语言习得.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施春宏. (2017). 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Brown, H.S.(2000).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th ed.).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 Cook, V. and Singleton, David,. (2014). Key topic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roydon: UK Ltd.
- Dhammadinna N. Sri Lankan Chinese [M]. Samayawardana Bookshop (Pvt) Ltd, 2018.
- Dianne Larsen-Freeman. (2000). Techniques and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Retrieved May 10, 2014, from, <http://www.scribd.com/doc/43944078/Weaknesses-of-Grammar-Translation-Method>
- Ellis, R,. (2000).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Gass, S. M., (1989).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wage, A.K.(2003). ELT Methodology. Kalutara: Hewage at Denuma Printers and Publishers(Pvt)Ltd.

- Howatt. A.P.R., (1984).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 Chuanren,. (2018).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bingdon: Routledge.
- Nikolova,I.(2013). The Direct Method. Retrieved May 08, 2014, from, <http://www.a2zteachers.com/category/learning-english/the-direct-method>
- Priyangika, N., (2023).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Sri Lanka. Prabhasha 2022 - volume 2, 47-61.
- Richards, J. and Rodgers T. (1986).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 and Rogers. (2001).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patten, B. and Benati, Alessandro,. (2015). Key term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